

# 关朗易学考论

李小成

(西安文理学院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5)

**摘要:**在从两汉到唐宋时期的易学发展中,尤其是在河图洛书方面,关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学者。但由于资料的匮乏,人们对其人其书缺乏了解和认识。该文从原始资料出发,先对其人的有无进行考证,再对其易著《关氏易传》作一辨正,并试图解决《洞极真经》的著作权问题,最后考述了关朗易学的传承脉络。在事实考证的基础上,确立了关朗在易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同时对文中子的研究亦有至为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关朗; 易学; 关氏易传; 洞极真经

**中图分类号:** B23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882(2005)02-0030-10

## A textual research on GUAN Lang's Yi-ology

LI Xiao-che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Xi'an 710065, China)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Yi-ology from the Han to Song dynasties, especially in the studies of the *He Tu* and *Lu Shu*, GUAN Lang is a comparatively important scholar. Yet, lacking relevant materials, people know little of him and his writings. Departing from original materials, this paper at first makes a textual research on whether there actually existed the figure or not, and then discriminates his works called *GUAN's Commentaries on Yi*, and attempts to clarify the authorship of *Dong ji Zhen jing* (*The True Canon at the Grotto Acme*), at last, makes clear of the lineage of transmission of GUAN Lang's Yi-ology. Based upon factual textual research, GUAN Lang's position i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 Yi-ology is established, and concurrently, these discriminations are of utmost importance to the studies on WEN Zhong-zhi.

**Key words:** GUAN Lang; Yi-ology; GUAN's Commentaries on Yi; *Dong ji Zhen jing*

### 一、关朗其人考

文中子《中说》卷十有《关朗篇》，其文曰：“或问关朗，子曰：魏之贤人也。孝文没而宣武立，穆公死，关朗退，魏之不振有由哉！”《全唐文》王福

时名下收有《录关子明事》，此文又附《中说》之后，其文曰：“关朗，字子明，河东解人也，有经济大器，妙极古算，浮沉乡里，不求宦达。太和末，余五代祖穆公封晋阳尚书，署朗为公府记室。穆公与谈《易》，各相叹服……太和八年，征为秘书长，迁给事黄门侍郎……俄帝崩，穆公归洛，逾年

收稿日期：2004-07-12

作者简介：李小成(1963-)，男，陕西华县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西安文理学院文学院教师。

而薨，朗遂不仕。同州府君师之，受《春秋》及《易》，共隐临汾山……盖王氏《易》道，宗于朗焉。”（卷161，第1647页）<sup>[1]</sup>这里的穆公是文中子的曾祖父，同州府君是文中子的祖父。这里对关朗的记载和唐赵蕤在《关氏易传》前的小传基本上是一样的。《全唐文》李延寿文有《关朗传》，传文是府君向关朗请教《易》学问题的对话，主要记述的是关朗的易学思想，对其人的生平只字未提。晁公武在《读书志》卷一云：“子明，朗字也。元魏太和末，王虬言于孝文，孝文召见之，著成《筮论》数十篇。”（第17页）<sup>[2]</sup>晁氏并未对关朗其人的存在持什么疑义。《宋史·艺文志》卷222记有“《关朗易传》一卷”。《宋史·艺文志》卷158子类儒家记“关朗《洞极元经传》五卷”，此大概是伪托之作，清人马国翰的《缙绅书》有关朗的《洞极真经》，至于《洞极元经传》一书，其他典籍均未提到，亦未见是书。《宋史·艺文志》卷160记“关子明注《安修睦都利聿斯诀》一卷”，此恐属伪托之作。《清史稿·艺文志》卷122道家类记“关朗《洞极真经》一卷”。史书既然这么记载，有些书可能是伪托其名，但是，其人的存在是肯定无疑的。而王冀民、王素在《文中子辨》一文中说：“关朗其人，史传不载。所谓《关朗易》者，亦不见于两《唐志》，宋人疑即传者阮逸所作。”（第246页）<sup>[3]</sup>此说以史传不载为由而否定其人的存在未免太过武断，历史上的人物可谓多矣，不可能人人尽书，况且唐人赵蕤在《关氏易传》前撰有关氏小传，其传曰：“关朗，字子明，河东解人也。有经济大器，或以占筮示人而不求宦达。魏太和末（魏孝文帝年号，二十三年而崩）并州刺史王虬（虬，文中子王通之先）奏署于明为记室，尝谓子明曰：‘足下今之英贤也，不可使天子不识。’因言于孝文帝，帝曰：‘张彝、郭祚昔尝言之（事见张太素魏书言之），朕以卜蓍之道，不足见尔。’虬曰：‘此人言微道深，非彝、祚所能知也。’诏见。帝问《老》、《易》。子明寄言玄宗，实陈王道，讽帝以慈俭，清静为本，而饬之以刑政礼乐。翌日，帝谓王虬曰：‘卿诚知人，关朗，管、乐之器，岂占筮而已。’虬拜舞称谢曰：‘昔伊尹负鼎以干成汤，今关朗假占筮而谒陛下，君臣感遇，固有所因。’自是使虬与子明著成《疑筮论》数十篇（即今《易传》是也）。孝文帝崩，明年，虬卒，子明遂不仕，居临汾山（在汾

州）。授门人《春秋》、《老》、《易》，号关先生学，虬长子彦，为同州刺史，亦师焉。彦悲先君与先生志不就，子明曰：‘乐则行之，忧则违之，何悲乎？’彦凡就子明，占兴亡治乱，言无不应，然必先人事而后语卦，彦不能测。……彦蹶然惊起，因书策而藏之，退而学《易》，王氏《易》道，盖宗关氏焉（文中子赞《易》有《七卜篇》，盖家传关氏学也）。子明既卒，河东往往立祠祭之，所著文集行于世。”（第145页）<sup>[4]</sup>

唐人赵蕤在《关氏易传》前给关朗写的这段小传，是我们了解关朗的重要资料来源。除此之外，唐以后提到关朗的材料很多，主要是在论述易学的著作中，尤其是后人在论河图洛书的文章中，无不提及关朗在河图洛书演变过程中的贡献，他对河图之文的看法是“七前六后，八左九右。”对洛书之文的看法是：“九前一后，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后左六后右。”（《经部易类》，第381页）<sup>[5]</sup>（卷70，子编道家类）<sup>[6]</sup>朱熹在《周易本义》前的“河图洛书”中引蔡元定语曰：“图书之象，自汉孔安国、刘歆、魏关朗子明，有宋康节先生邵雍尧夫，皆谓如此，至刘牧始两易其名，而诸家因之。故今复之，悉从其旧。”<sup>[7]</sup>明代学者方孔炤在《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卷四、卷五多次提到关朗对河图洛书的见解（《经部易类》，第212至213页）<sup>[8]</sup>。在《世系族谱》中对关朗的世系身世有明确的记载：“祖关审，字问之，号盘石，生于汉和帝永元二年庚寅岁。居解州常平村宝池里，冲穆好道，以《易传》《春秋》训子，至桓帝永寿三年丁酉岁卒，寿六十八。父关毅，字道远，性至孝居，父丧庐墓三年，庚子岁六月二十四日生关羽于故里。关羽，按《广义祀典》记载，关羽，字云长，出夏大夫龙逢之后，生于汉桓帝延禧三年庚子岁六月二十四日，终于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七日。关羽英秀奇伟，少读父书不辍，尤深《左氏春秋》。年十七娶胡氏，生三子，长子平、次子兴、三子索。长子关平，关平，字坦之，生于灵帝光和元年戊午岁五月十三日，少随父任事，躬亲矢石，临阵不离左右。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七日与父同时遇难，克全忠孝，享年四十二。次子关兴，关兴，字安国，少有令闻，武侯深器之，弱冠为侍中中监军，伐吴获仇雪恨。生二子长曰统、次曰彝，建兴十二年二月病卒，享年二十四。

三子关索，关索，字维之，己亥之难奔川请兵报仇，建兴二年从武侯征孟获为先锋。长孙关统，关统，袭封爵尚公主官虎贲中郎将，景耀三年十月卒，无嗣。仲孙关彝，关彝，嗣汉寿亭侯爵，炎兴元年八月拜前将军拒魏，十月战歿，一子名敞。曾孙关敞，关敞，官谏议大夫，炎兴元年魏人入蜀隐信都。玄孙关朗，关朗，字子明，习《春秋》《易传》，魏屡征不仕。关朗以下族裔悠远不能全谱。”<sup>[9]</sup>这个世系族谱是综合了几种族谱和史书的记载而来的，但亦未必真实可靠，可为之参考。

关于关朗谱系的记载，还有四种《关氏家谱》：一是山西运城市北相镇西古村《关氏家谱》，这个村庄是关氏后裔的聚居地，村里有北魏孝文帝时的关朗墓，墓碑题“魏记室关公诵朗字子明墓”。此家谱曾于清雍正九年重修，至于修成于何时未有确记。但家谱与《关氏历代世系图》相似。二是河南尉氏县张市《关氏家谱》，此谱修撰于清咸丰年间，在序中介绍了关氏后人先后从运城迁徙到河南各地的情况。三是河南洛阳市李屯《关氏家谱》，这个族谱列关羽为始祖，这是与别的族谱不同之处。四是《关氏历代世系图》，它是据康熙十七年在解州关羽故宅一枯井中发现的一块古砖而来的，古砖上备载了关家数世名讳和生卒年月，按《关圣帝君世系图》，始祖关龙逢，曾祖，考毅，羽，子兴、平、索，孙统、敞、彝，玄孙朗。有人认为关龙逢、关朗、关播、关珍、关天培等关姓名人，乃为关羽信奉者附会所致。然不管怎样，他们都没有否认关朗的存在。至于关羽与关朗的关系，由于史料记载不够充分，对于家谱和世系图的记录暂可存疑。但在裴松之所注的《三国志》中提供的有些资料，可以看出家谱所言并不尽是攀结附会，《关圣帝君世系图》云：“关羽英秀奇伟，少读父书不辍，尤深《左氏春秋》。”而裴注《三国志》中亦云：“《江表传》：羽好《左氏春秋》讽诵略皆上口。”这两条材料可以相互印证，由于裴松之注书时要早于关朗的活动时期，即使二人同时代，但当时南北阻隔，互不了解，裴注不载关朗事亦乃情理之中。

## 二、《关氏易传》辨正

《关氏易传》乃关朗所作。在所有见之于典

籍中的《关氏易传》的著作权问题，皆署名关朗或关子明，有的用“旧题北魏关朗”。在《四库全书总目》卷七，易类存目，经部有：“《关氏易传》一卷（内府藏本），旧题北魏关朗撰，唐赵蕤注。朗字子明，河东人，蕤字大宾，梓州盐亭人（详见子部杂家类《长短经》条下），是书《隋志》《唐志》不著录，晁公武《读书志》谓：李淑邯郸《图书志》始有之，《中兴书目》亦载其名，云：阮逸迳次刊正。陈师道《后山丛谈》、何蘧《春渚纪闻》及邵博《闻见后录》皆云：阮逸尝以伪撰之稿示苏洵，则出自逸手至无疑义。逸与李淑同为神宗时人。故李氏《书目》始有也。《吴莱集》有此书后序，乃据文中子之说，力辨其真，文士好奇，未之深考耳。”朱熹一面说：“《关子明易》是阮逸伪作，《陈无己集》中说得分明。”一方面又在《易学启蒙》的“原卦画第一”篇说：“关子明云：河图之文，七前六后，八左九右。洛书之文，九前一后，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后左六后右。”朱熹既承认《关子明易》是阮逸伪作，又引用关朗的说法。其实朱熹说《关子明易》是阮逸伪作，并未深究实考，只是采用陈师道的说法说：“《陈无己集》中说得分明。”陈师道《后山丛谈》卷二云：“世传王氏《元经薛氏传》、《关子明易传》、《李卫公对问》，皆阮逸所作，逸以草示明允，而子瞻言之。”朱熹所言即据此出。既是一部伪书又采其说，岂不是承认其书不伪吗？可以看出朱熹并不以为此书是阮逸作伪。明末学者方孔炤在他的易学著作《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中论及《关子明易传》，在卷之四“关子明易传约”条下专论关朗的易学思想。清人杭章斋《学易笔谈》（附三种）中的《易楔》卷一“图书”中，论及关朗在易图的发展中有重要的作用。“图书之学”从汉之刘歆、刘向父子到《参同契》，中间经过北魏关朗的以“十为河图，九为洛书”的思想，对北宋时邵康节在河图洛书上的完善有直接的作用，宋代学者在论及河图之学时一般都是提到关朗的易学思想。王船山在《读通鉴论》里论南北朝河西之儒时对关朗有很高的评价。他说：“北方之儒较醇正焉，流风所披，施于上下，拓拔氏乃革面而袭先王之文教，宇文氏承之，而隋以一天下，苏绰、李谔之指具，关朗、王通开唐之文教，皆自此防也。”

《关氏易传》中的易学思想。在唐赵蕤注的

《关氏易传》前,有他作的关朗传,《全唐文》卷 154 中收有李延寿的《关朗传》一文,就在此卷亦收有王福峙的《录关子明事》。经比照,李延寿的《关朗传》文本最短,赵蕤的关朗传次之,而王福峙的《录关子明事》材料最为丰富,从表面上看,赵蕤和李延寿的传文来自于王福峙的《录关子明事》,而李延寿的《关朗传》是截取《关氏易传》前小传中论易的部分,去其前后两端生平事迹的记载,从“先生每及衰之际,必曰用之以道,辅之以贤……噫,天命人事其同归乎?”中间这一大段文字几乎完全相同,所别者是把蕤传中的“彦”与“朗”的对话,改成了“府君”与“朗”的对话,还有个别用字的不同,如“亡”与“衰”。由此观之,李延寿可能是从赵蕤的传中抄出的。从近拥有材料的多寡来看,王福峙的《录关子明事》显然要比其他两个人传中写的要丰富得多。但从内容上看,三人的传文皆取于《关氏易传》首篇的《卜百年义》,他们都要突出关朗的易道高深、幽微难测的一面,亦从中体现出他的易学思想。关朗在《关氏易传》中解卦时最突出地体现了易学“变”的思想,他说:“吉凶有前期,变而能通,故治乱有可易之理。是以君子之于《易》,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问之而后行,考之而后举,欲令天下顺时而进,知难而退,此占算所见重于先王也。故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倾。”(《经部易类》,第 145 页)<sup>[10]</sup>“变”是《周易》的基本观念,孔颖达在《周易正义》卷首就明确地说:“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sup>[11]</sup>可谓一语道破《易》之奥秘。就《易》的爻位来说,爻象在六位中可以上下往来,是变动不居的。《易·系辞》说:“爻者言乎变者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道有变动故曰爻”。爻就是用来表现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的。刚与柔相互变动推移,“变”的意义就体现了出来,亦即《系辞》所说的“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关朗所占的夬之革,此即卦变者,阴阳相推,爻位互变,刚消柔长,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百年之世事变化,人事之悔吝吉凶,皆以卦象明矣。故《系辞》云:“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爻象是变化的,有进有退,进退消长,这也是

天地人三才的至极之道,是宇宙的普遍法则。在关朗的传中述及“变”的易学思想,也可以说是《关氏易传》的一个主要思想。

《关氏易传》今收《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易类,是书一卷,据明嘉靖范氏天一阁刻本影印,原书板框高 205 毫米,宽 294 毫米,初唐天水赵蕤所注,四明范钦订,前有赵蕤的序文,继之以关朗小传。该书分为:卜百年义、统言易义、大衍义、乾坤之策义、盈虚义、阖闾义、理性义、时度义、动静义、神义和杂义共十一章。原书比现在所见到的唐注本要多,赵蕤在序中说:“蕤非圣人,五十安知天命。然从事于《易》,虽乱离中未尝释卷,盖天命深微,莫研其极,而子明之传,蕤粗通之,然恨此书亡篇过半,今所得者,无能诂次,但随文解注,庶学者触类而长,当自知之耳。”在这段序文中,我们了解到现存的本子最少是原书的一半,且从关朗所处的时代到初唐一直是动荡离乱的,尤其是北方。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无暇于学术,故于篇籍无能诂次,亦使北学难于南学。就南北朝时期而言,易学中以王弼派的易学占上峰,《周易正义序》云:“唯魏世王辅嗣之注独冠古今,所以江左诸儒,并传其学,河北学者,罕能及之。其江南义疏十有余家,皆辞尚玄虚,义多浮诞。”<sup>[11]</sup>南方时局较北方相对稳定,故于《易》之义疏有十余家,不管怎么玄虚空无,研究者还是比较多的,而河北之学的经师人数较少,且专主郑玄易学。在马宗霍的《中国经学史》中论南北朝的易学经师时说:“北朝传经之儒,《北史》所载,多于南朝,然其间号为大儒,能立宗开派者,当推徐遵明。……而诸经之传,多自遵明开之,《易》则易传卢景裕(景裕注《周易》、《尚书》、《孝经》、《论语》、《礼记》,其《毛诗》、《春秋》、《左氏》未讫,所注《易》大行于世)。崔瑾、景裕传权会(会少受郑易,妙尽幽微,《诗》、《书》、《二礼》,文义该洽,注《易》一部,行于世)、郭茂,其后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门。”(第 81—82 页)<sup>[12]</sup>北朝传《易》之作并不太多,且其皆已亡佚,马宗霍说:“今其书虽皆已亡佚,然唐人《五经正义》,盖不能无本于诸家也。乃仅皇、熊二家,其名犹见于《礼记正义》,余则可考者少,惜哉!”(第 88 页)<sup>[12]</sup>虽然说北朝经学义疏之作今已亡佚,但在初唐肯定是有一些的,今传孔颖达的《正义》中就见其名,所以才有初唐的赵蕤

注《关氏易传》，不过其时也已是一亡佚过半了，由此亦可证《关氏易传》不伪。

关朗在首篇《卜百年义》中，以与同州刺史王彦问对的形式，占断百年的王朝更替，以《夬》之《革》的九二化为六三，推衍出时变之数，后皆应验。可参看赵蕤的注。在第一章《卜百年义》中体现了《易》理的变动不居，赵注云：“言夬，决尽，则将有革命者也。”“革，去故也，是以旧者不利，东魏旧业，故先亡。”“革尽则变，乱穷则治，数穷则始，故必有布衣恭俭者出焉，易理然也。”关朗从《夬》卦之变《革》卦，亦能推出变革的具体年份，明主所出之方位，使人倍感《易》理幽深，天教通神。

第二章统言《易》义，主要讲乾坤之义，这里也体现了“变”的思想，关朗云：“观其变，极其数，知其来。”赵蕤注说：“关氏易占，极变而已。”此可谓一语中的，了其精髓。

第三章大衍义，《易·系辞上》第九章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对此关朗有独特的理解，他说：“天数兆于一，生于二，成于三，此天地人所以立也，衍于五，成于六，偶于十，此五行六爻十日所以错综也。天一，数之兆也，虽明其兆，未可以用也。地二，数之生也，有生则滋，乃可以推之也。天三，数之极也，极乎终则及乎始，兼两之义也。”关朗又以五行解释《系辞》，其中贯穿着道家思想，如：“有生于无，终必有始，既有则无去矣，故大衍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人有去无之谓也。”门人张彝不懂何谓“如有去无”，关朗云：“天生于阳成于阴，阴成则阳去。生于阴成于阳，阳成则阴去，六爻初上无位者，阴阳相去者也，天数以三兼二，地数以二兼三，奇偶虽分，错综各等，五位皆十，衍之极也，故曰大衍。”在本章精到之论颇多，很难一一征引。接下来关氏又以往来盈虚来解释大衍之数。

第四章乾坤策义，讲乾坤之策数，又策数而及于历法、盈虚，在本章中赵蕤所注寥寥几处，不明关氏所言之深意。

第五章盈虚义，接上篇继续给弟子张彝讲何

为盈虚。他说：“当期之数，过者谓之气盈，不及谓之朔虚。”关朗所讲的盈虚，来自于魏伯阳《参同契》的月体纳甲说。所谓月体纳甲，它是以月亮的盈亏，说明一月之中炼丹用火的程序，其以坎、离两卦代表日月，其他六卦代表月亮的盈虚过程，八卦各配以干支，《参同契》是汉易中的“卦气说”与“炼丹术”的结合，它将炼丹的用火同月亮的盈虚和四时的变化联系起来，以温度来应丹事，其理论思维的核心是阴阳消长和五行生克说。关朗在这里无不残留着这一思想影响的痕迹，如：“五之为善，五行六气推而运也，七百二十为起法，七千二百为统法，七十二万为通法，气朔之下，收分必全尽。”

第六章阖闾义，所谓阖闾，关氏言：“以气言之为启闭，以道言之为离合，以内外言之为往来，故卦有内外，人有出入，往来相交，上下相刑，吉凶相分，君子小人，相享相屯。”阖闾就是往来不穷，在这无穷无尽的变化中，吉与凶并无定居，君子与小人亦然，君子亨则小人屯，小人亨则君子屯，这就是一阖一闾，就是变通。“故一阖一闾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其实本章就是发挥《系辞上》中的“是故阖户谓之坤，闾户谓之乾，一阖一闾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

第七章理性义，主要是讲乾之德。关氏认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而“性命之理，以天言之曰阴阳；以地言之曰柔刚；以人言之曰仁义，盖乎一性也。有生有命，有命有性，有性有情。”即天命，人命也，天命是历数，人命是道德，有命者亨之塞之，不离乎仁义之道，此谓之有性。乾卦纯阳，具四德五性，四德在天而有亨有塞，五性在人而运命有否有泰，天人相契，则合于性命，此亦乾道之变化。关氏把情当作邪气，因为它可以乱人之行，正确的行为应是“去邪远乱，制情则元命立”。元命即天命人命，在《易》中的元命是群阴之尊，元亨利贞，此乃天人之理。在关朗那里，只有穷极天命人命二性，则知生死之说，得性命之理，顺天立性，理解了否、泰两卦的时，就一切都会因时而动，知命适时。

第八章时变义，时与变在《周易》中是很重要的概念。对“变”的强调是无处不在的，“时”在《易》中也是极为关键的，物得时以通，乾卦下的《文言传》曰：“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

御天也。”掌握好了时才能“云行雨施，天下平也。”坤卦六三的《象传》云：“含章可贞，以时发也。”京房云：“静为悔，发为贞。”虞翻训“发”为“动”，三为阳位，虽发为贞。《周易集解纂疏》云：“变动有时，故以时发，苟非其时，则‘含’而不发也。”（第80—81页）<sup>[13]</sup>丰卦《象传》亦云：“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此言四时之象，一年十二月之消息，亦因时也。《易》虽言变，要之因时也。所以关氏本章主要讲因时而变。故言“作《易》者承时效变之谓乎！”“卦以存时，爻以示变，时系乎天，变由乎人。”赵蕤注云：“王弼曰：以爻为人，以位为时。”今关氏义同《文言》。蕤谓天人和，须不可异也，卦以爻成，时以变生，虽云天时人事，及其变则合会一也。“时”的问题在上一卦末尾已经提出，本章紧承其义，把时与变联系起来，并以屯、既济为时变之际来加以说明，即时未定曰屯，时已定曰既济，屯与既济则是时变交替也。关氏认为乾坤用以分时，如门户用以分内外一样，屯、既济则像门户的开合，始与终相及也。

第九章动静义，关氏以天地喻动静，他说：“天常动，地常静，常动柔克刚者也，常静刚克柔者也，故曰动静有常，刚柔断矣。……至动必多忧，至静必多疑，不忧不疑，其惟有常乎？至常忘机，至宁忘乐，斯动静之中也。”动与静不可失于时、失于中，动静有常，即要有常态。《易·系辞》亦云：“动静有常。”所以动静要适宜，适时，适中，过与不及皆不可也。“知动则知神，知神则知静矣。”“神”在《系辞》中出现的频率很高，如“神无方而《易》无体”，“阴阳不测之谓神”，“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显道神德行”，“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等等。其中所讲的“神”，一般是神妙、难以预测之意，关氏这里的意思亦同于此，是不行而至，不疾而速的。另外，这两句话和《老子》的“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第十六章，第65页）<sup>[14]</sup>的意思相同。

第十章神义，是关氏对“神”的进一步解释，他认为搞清神的含义非常重要，若对“神”之义疑而不知，那就无法与之言《易》。关氏曰：“神也者，《易》之灵也。”“神”是《周易》的灵魂。那么神是什么呢？他的理解是“灵应冥契，不思而得强，名曰神。”而“《易》之神在乎道，而所神在人也。”在《易·系辞》中“神”字出现很多，人们在不同的

地方有不同的解释，虞翻曰：“乾神似天，坤鬼似地。”郑玄曰：“精气为神，游魂为鬼。”（第555页）<sup>[13]</sup>在“阴阳不测之谓神”句下，韩康伯曰：“神也者，变化之极，妙万物而为言，不可以形诂者也，故阴阳不测。”孔颖达疏曰：“‘神也者，变化之极者’，言神之施为自将，变化之极，以为名也。云‘妙万物而为言’者，妙谓微妙也，万物之体，有变可寻。神则微妙于万物而为言也，谓不可寻求也。”（第562页）<sup>[13]</sup>关氏在神义篇讲的神也有上述几种意思在，但更为重要的是他认识到了“神也者，《易》之灵也”。

最后一章杂义，类似于《易·序卦》，但他的解说又类似于《文言传》。从总体上看，本章文字有佚，内容似不完整。因为其书传到初唐赵蕤作注时已经佚失过半，里面涉及到的卦只有三十六个，估计可能有残缺的情况。仅就残文来看，关氏的见解颇有独特之处。我们知道，《周易》的六十四卦起于乾终于未济，这是因为“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而关氏则以既济为终，赵蕤注云：“盖未济者，入屯首也。天地不交，坎、离不接，是未济也。天地始交，云雷相遇，然后有屯也。文王、仲尼终之以未济者，时可知‘戾然’终焉，二字疑非仲尼之辞，盖后人传之误也。夫既者，尽也，尽济则终焉，此义为得也。”韩康伯认为：“有为而能济者，以己穷物。物穷则乖，功极则乱，其可济乎？故‘受之以未济’。”（第728—729页）<sup>[13]</sup>韩康伯所释是乘既济而来的，他认为已“穷”已“极”了，就难以“济”了，故“受之以未济”。我们认为赵蕤对关氏所注为是，坎本坤体，离本乾体，既济是离下坎上，水性就下，火性炎上，火煮水干，故既济。关氏以既济为终，可谓宜矣。

《关氏易传》的主要版本有：1.《关氏易传》一卷（北魏）关朗撰，清顺治3年（1646）宛委山堂刻本，1册（说郛）。2.《关氏易传》一卷（北魏）关朗撰，清乾隆56年（1791）王谟刻本，粉纸，系白文，无赵蕤注，1册（增订《汉魏丛书》）。3.《关氏易传》一卷（北魏）关朗撰，（唐）赵蕤注，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本，1册（1函）（《津逮秘书》）《易庐》。4.《关氏易传》一卷（北魏）关朗撰，（唐）赵蕤注，清嘉庆10年（1805）虞山张氏照阁刻本，1册（《学津讨原》）。5.《关氏易传》一卷（北魏）关朗撰，

(唐)赵蕤注。1976年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明嘉靖天一阁刻本影印(无求备斋易经集成)。

### 三、《洞极真经》辨正

《宋史·艺文志四》子类儒家记：“关朗《洞极真经传》五卷。”<sup>[15]</sup>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第22册，在元胡一桂《周易启蒙翼传外篇》中收有关朗的《洞极真经》，前有胡一桂的案语和序。在清人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子编道家类中辑有《洞极真经》，但这个辑本明显是从胡一桂《周易启蒙翼传外篇》中辑来的，据《中国丛书综录》记，《玉函山房辑佚书》的《洞极真经》的版本有懋环馆本、重印本、越南书局本。

在《周易启蒙翼传外篇》的《洞极真经》前有关朗的自序，其序云：“朗，业儒，蓄书积数世矣。自六代祖渊，会鼎国之乱，徙家于河汾，所藏之书，散佚殆尽，其秘而存者，唯《洞极真经》而已。六世祖尚谓家人曰：《洞极真经》，圣人之书也，吾后数世，当有贤者生，如得其用，功不下于稷、契，倘不时偶，其颜渊之流乎！”从关序可以看出，此书并非其自著，只是家传的圣人之书。但此书在传到关朗时，他就自己的所学所识，对本经作了传，亦附有其师崆峒道人的《翼》，序云：“因以先生之《翼》则附于《经》，又编其遗言为《洞极论》。凡十一篇，复作传，以释其蕴，为图以序，庶乎来者知《洞极》之道焉。”胡一桂在《周易启蒙翼传外篇》的说法比较正确，他在案语中说：“《洞极真经》，莫知作者，而元魏关朗子明之所传次也，虽无预于《易》，然序《本论》，述圣人，本河图以画卦，朱子《启蒙》之援证，其为极也。”但朱熹在《易学启蒙·原卦画第一》说：“关子明云：河图之文，七前六后，八左九右；洛书之文，九前一后，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后左六后右。”又说：“关子明《易》是阮逸伪作，《陈无己集》中说得明白。”(卷67)<sup>[16]</sup>由于后一句话是在语录体中的对话，故有不严谨之处。其实朱熹把话说得含混了一些，只是未把经和传分开来，他在《易学启蒙》中所引的关子明河图洛书之说，并不是出于《关氏易传》，而是出于《洞极真经》的《序本论》篇，这个我们一看胡一桂的《周易启蒙翼传外篇》便一目

了然。笔者手头就有亲自从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22—391中抄出的《洞极真经》，而现在有些人不读原著，竟曲引之，说：“此言之者以江永说为一证”。江永在《河洛精蕴》中说：“元魏太和时，关朗子明，述其六代祖渊有《洞极真经》。其《序本论》云：河图之文，七前六后，八左九右……”江永的说法亦为客观。本来事实就很清楚明白，经大学者一含混其词，人们便不知所之了。有人竟以为《关氏易传》与《洞极真经》是一部书，此更谬矣，皆为不读书之故。郑樵在《通志·艺文略》中就说：“《周易传》一卷，后魏关朗撰，唐赵蕤注(入《传》类)。”“《洞极真经》一卷(无撰著者，入《拟易》类)”。可见南宋初郑樵(1104—1162年)所见为两部书，一是题为关朗撰的《周易传》，一是没有题撰著人的《洞极真经》。而《易学启蒙》所引的“关子明曰”，就是出于《洞极真经》，作者误将《序本论》中的子曰下的一段有关河图洛书的说法当成了关子明的话。按关氏在序中说的“因以先生之《翼》，则附于《经》，又编其遗言，为《洞极论》，凡十一篇，复作传，以释其蕴，为图以序”。关朗在这里说得明白，《论》这一部分是把先生的遗言编纂起来的，亦非自己所著，所以，是朱熹把这一细节忽略了。

至于阮逸所伪之书，《后山丛谈》曰：“世传王氏《元经薛氏传》、《关子明易传》、《李卫公问对》，皆阮逸所著。”其中并无《洞极真经》。李淑在《邯郸书目》中说：“阮逸论次，刊正《洞极元经传》五卷(逸字天隐，宋仁宗时人)，关子明以生、资、育为传，以释其蕴，为经论十一篇。”(《经部易类》，第44册，第721页)<sup>[17]</sup>清人胡渭在其下注曰：“《玉海》云：《子明易传》卜百年义第一，次以统言《易》义，大衍乾坤策，盈虚、阖闢、理性、时变、动静、神义、终之于杂义第十一。”(《经部易类》，第44册，第721页)<sup>[17]</sup>胡渭所注，显然有误，因《洞极真经》与《关氏易传》皆十一篇，而李淑说的是《洞极真经》，但胡渭又以《关子明易传》十一篇释之，是他把两本书看成了一本书，《邯郸书目》亦未说《洞极真经》是阮逸所伪。不过也有人说《洞极真经》是阮逸所伪的，《易图明辨》卷五云：“姚氏曰：世所传关子明《洞极真经》，亦言‘河图洛书’如刘氏说而两易之，以五方者为图，九宫者为书。按唐李鼎祚作《易解》，尽备前世诸儒之说，独无关氏。

至本朝阮逸始伪，作《洞极经》，见于《后山丛谈》，则关亦不足为证矣（见《周易玩辞》）。”（《经部易类》，第44册，第721页）<sup>[17]</sup>而姚氏言伪，其据只是《后山丛谈》而已，但该书并未言及阮逸伪《洞极真经》，只是说到了《关子明易传》，唐李鼎祚《易解》不引，是因为其书佚失过半，对《易》之解恐不符合李氏的观点。况且解《易》之书非常多，虽是集解，亦不能尽入其集，只不过是选几种代表性的观点而已。故不能以李鼎祚《易解》不引为据而武断其书不存。《易图明辨》紧接着又说：“雷氏《易图通变》曰：杨次公自著《洞极经》，托名于关子明。”胡渭在按语中说：“杨杰，字次公，元丰中与范缜论乐《洞极经》，果为杰所撰，则又出阮逸之后，恐非。”由此看来，杨杰不能伪作《洞极经》，亦无从看出有阮逸作伪的迹象。还是《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说得明白，《“关子明传”》曰：“兆于一，生于二，成于三，此天地人事所以立，衍于五，成于六，偶于十，此五行六爻十日（支统于干），所以错综也。”（《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卷四“关子明传约”）<sup>[8]</sup>“此书不必关子明，而理自得《易》中一端之精处，惜不知先天八卦以二四八六立体，则亦何以名洛之维正耶！《子明易传》曰：一不可用，二生可推，三极中而兼两，六来则一去，以三十与十二明著，开百原之端，故知《洞极》非子明手。”（《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卷五）<sup>[9]</sup>这个问题已经很清楚了，还有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就是在关朗的传中提到：魏太和时期，王虬言于孝文帝，帝召关朗，著成《筮论》。《筮论》和《洞极真经》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在方孔炤的《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中可见其端倪，方氏说：“李邕曰：《洞极经》，关朗家藏，亲受于林崧峒者，魏太和中，王虬言于孝文，召之，著成《筮论》，已采具蓍衍篇下。

一四七，天生☳，焕（育乘其一），实（育乘其二），兴（育乘其三），燠（资乘其一），茂（育乘二），达（育乘三）<sup>①</sup>，序（育一资二），和（有二资一）；

二五八，地育☷，（后分）萌（生乘其一），华（生乘二），安（生乘三），悖（资乘其一），止（资乘二），静（资乘三），息（生一资二），紊（生一资二）<sup>②</sup>；

三六九，人资☱，抑（生乘其一），用（生乘二），作（生乘三），冥（育乘其一），塞（育乘二），平

（育乘三），通（生一育二），几（生二育一）。”（《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卷五）<sup>[8]</sup>

这里所记和《洞极经》基本一致，《洞极》列生传第一，资传第二，育传第三，而李邕记的顺序是生、育、资。生卦中有焕、实、兴、燠、茂、达、序、和，育卦有萌、华、安、悖、止、静、息、紊，资卦有抑、用、作、冥、塞、平、通、几。生、育、资是三个主卦，有统领其余各卦的作用，就像《周易》中的乾、坤二卦一样，这是关氏因家传而解卦的独特方式。笔者认为《筮论》和《洞极真经》是源与流的关系，《筮论》源于《洞极真经》，遗憾的是《筮论》今已不存。

#### 四、关朗易学的传承

关朗在北魏时就以《易》名于世，赵蕤的《关氏易传序》云：关朗“有经济大器，或以占筮示人而不求宦达。魏太和末，并州刺史王虬奏署子明为记室。尚谓子明曰：足下今之英贤也，不可使天子不识。因言于孝文帝，……帝谓王虬曰：卿诚知人，关朗，管、乐之器，其占筮而已。虬拜舞称谢曰：惜伊尹负鼎以干成汤，今关朗假占筮而谒陛下，君臣感遇，固有所因。自是使虬与子明成《疑筮论》数十篇（即今《易传》是也）。孝文帝崩，明年，虬卒。子明遂不仕，居临汾山，授门人《春秋》《老》《易》，号关先生学。”（《经部易类》，第145页）<sup>[4]</sup>《中说》后附《录关子明事》中亦有同样的记载（卷182，第1853页）<sup>[1]</sup>。两者几乎相同，不过《录关子明事》所记更为详尽一些。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王虬向皇帝举荐了关朗，证明两人早有交往，不说受其影响，起码是了解了他在易学方面的造诣，后孝文帝说：“且与卿就成《筮论》。”既然文帝让他们共著《筮论》，其思想必有一致之处，在易学上有相同的见识。关朗是以《易》名世，而王虬是并州刺史，是伯乐以识马而已，自己不过是喜《易》而略有所见耳。在以后的著《筮论》过程中，承传关朗的易学思想是为不

① “茂（育乘二），达（育乘三）”中之“育”字，当为“资”字。

② “紊（生一资二）”，当为“紊（生二资一）”。

误。

王虬卒后，其子王彦心向关朗之学，赵蕤在《关氏易传序》中说：“虬长子彦，为同州刺史，亦师焉。”《录关子明事》云：“同州府君师之，受《春秋》及《易》，共隐临汾山。”（第52页）<sup>[18]</sup>文中详细记载了同州府君与关朗对易学的探讨，关朗以蓍卦占百年之事，每事皆令府君折服，于是“府君骤然惊起，因书策而藏之，退而学《易》。盖王氏《易》道，宗于朗焉。”（第54页）<sup>[18]</sup>同州府君临终前对其子铜川府君说：“关生殆圣矣，其言未来，若合符契。”（第54页）<sup>[18]</sup>铜川府君生文中子，文中子《续六经》中有《赞易》一书，亦承关朗《易》道，赵蕤注《关氏易传》说：“文中子《赞易》有《七卜》篇，盖家传关氏学也。”（《经部易类》，第145页）<sup>[12]</sup>文中子祖从王虬始，延及于后代，无不受关氏易学的影响。杜淹在《文中子世家》中说：“开皇四年，文中子始生，铜川府君筮之，遇《坤》之《师》，献兆于安康献公，献公曰：素王之卦也，何为而来？地二化为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众正，可以王矣。虽有君德，非其时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第48页）<sup>[18]</sup>文中子祖父喜关朗之学，与之共隐临汾山，虽未见记其父与关朗之交，但从给文中子取名可见，其受关氏的影响实属不可避免。

文中子治学，于《易》有《赞易》七十篇，列为十卷，惜其不存。今传《中说》卷五有《问易篇》，此篇非专论《易》之作，只因开头以“问易”二字始而名之，其他各篇亦有与弟子关于《易》的问答释疑之辞。我们知道关朗易学是承汉阴阳象数学派而来，多讲阴阳灾变，王氏家传的易学对这一点不无体现。王通对易的看法也是以卦爻明阴阳之变、天下之事。《述史篇》曰：“《易》，圣人之动也，于是乎用以乘时矣，故夫卦者，知之乡也，动之序也。”《王道篇》曰：“薛收问至德要道，子曰：至德，其道之本乎！要道，其德之行乎！《礼》不云乎，至德为道本，《易》不云乎，显道神德行。子曰：大哉神乎，所自出也。至哉《易》也，其知神之所为乎。”王通所说的“神”也是关朗易学中涉及到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关氏易传》第十《神义篇》云：“神也者，《易》之灵也，灵应冥契，不思而得强，名曰神，犹言神灵昉，响灵应无迹者也，日月之明在乎天，而所明在地也。《易》之神，

在乎道，而所神在人也。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又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神无方，道无迹，人无至，斯可以议《易》矣。”关于“时”的问题，《关氏易传》第八《时义篇》讲：“卦以存时，爻以示变，时系乎天，变由乎人。昼动六时也，夜静六时也，动则变，静则息，息极则变，变极则息，故动静交养，昼夜之道也。乾坤分昼夜，时也；屯济，时变之际也。”《中说》里涉及“时”的问题也很多，《问易篇》曰：“子赞《易》，至《序卦》曰：大哉，时之相生也，达者可与几矣。至《杂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与存义矣。”《述史篇》记文中子赞《易》之叹曰：“子赞《易》至于《革》。叹曰：可矣，其孰能为此哉？至初九，曰：吾当之矣，又安行乎？”《革》卦《象传》曰：“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郑玄曰：“革，改也。水火相息而更用事，犹王者受命，改正朔，易服色，故谓之革也。”（第435页）<sup>[13]</sup>《革》卦讲变，而变之机微在时，这正是关朗易学的一个核心思想。《关氏易传》第八时变义，主要讲“时”的意义，“卦以存时，爻以时变，时系乎天，变由乎人。”文中子赞《易》至《革》之初九而叹“吾当之矣，又安行乎”看来，文中子深明“时”之义。初九位卑，虽有潜龙之势，终无出而革之之力，《革》卦初九《象》曰：“巩用黄牛，不可以有为也。”虞翻曰：“得位无应，动而必凶，故不可以有为也。”（第438页）<sup>[13]</sup>文中子认为《易》的精髓在于“畏天悯人，思及时而动乎！”（《周公篇》）曰：“《易》，圣人之功也，于是乎用以乘时矣。”（《问易篇》）文中子强调“时”用，是从家学那里秉承了关朗的易学思想。

到了文中子的孙子王勃，虽以诗文名显初唐，但于易学亦有著述，今《全唐文》卷182就收有王勃的《八卦大演论》，集中表述了他的易学思想。除此而外，在其他文章中亦体现出王勃的易学思想。如他在《上绛州上官司马书》中云：“妙造无端，盛衰止乎其域；神期有待，动静牵乎所遇。”<sup>[19]</sup>王勃在《为人与蜀父老书》中认为：“天地作极，不能迁否泰之期；川岳荐灵，不能革穷通之数。”指出：“圣贤同业，存乎我者所谓才；荣辱异流，牵乎彼者所谓命。”<sup>[19]</sup>在《上百里昌言疏》中云：“勃尝闻之大《易》曰：人之所助者，信也；天之所助者，顺也。是以君子不以否屈而易方，故屈

而终泰；忠臣不以困穷而丧志，故穷而必亨。”天道运行有一定之“数”，是循环往复的，人生遭际亦是如此。在其他的文中亦不时有易学观念的闪现，其学术背景主要是深受祖父王通的影响。

从大的学术划分来说，关朗的易学属北方易学中的阴阳象数学派，王通的易学就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即用阴阳象数的卦爻变通之法推知人生的穷通困达。到了初唐的王勃亦认为卦爻变化为人们认识人生的穷通困达提供了理论方法。他在《八卦大演论》中说：“三才者，《易》之门户也；八卦者，《易》之径路也。引而伸之，终于六十四卦，天下之能事毕矣。陈而别之，极于三百八十四爻，天下之微理罄矣。”（卷 182，第 1853 页）<sup>[1]</sup>天下万物之理莫不出于卦爻之中，人之穷通困达亦不能出乎其外：“三才之道，不可不及也；五行之义，不能复过也。翕之以幽明，张之以寒暑，会之以生死，申之以去就，祸福生焉，吉凶著焉，成败行焉，逆顺与焉。……故古往今来，寒进暑退，死生乱动，是非滕结，未尝非两仪也。而未尝离太极也，故曰有寒有暑，则两仪不废也，无思无为，则太极未尝远也，见之则两仪，亡之则太极。”（卷 182，第 1854 页）<sup>[2]</sup>在王勃看来，三爻之变，乃天地之数，所以他强调的“穷通之数”、“否泰之期”，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数”、“期”，而大《易》之数、象数之数，是由卦爻变化显示出来的天地万物的普遍规律，人事之困达穷通以循于此。个人只能随顺而变而不可改之。因此，人们只能“见危受命，立身俟时”，一切皆应待“时”而动。王勃对“时”的重视明显从家学那里秉承了关朗的思想。

初唐于经学研究，出现了融汇南北，总结前人成果的局面，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就是对东汉以来各派经师注释的一次大总结，对各种歧义的一次统一，《周易正义》在总结的同时，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具有调和象数和义理两大学派的倾向。王勃的易学观念就秉承乃祖而参之以初唐官方易学，去象数之繁琐，把繁复的卦爻相次变化之理概括为“一理”可证，即《八卦大演论》说的“是以贞一之德，权六爻之变，振三才之柄，寻万方之动，又何往而不通乎？又何疑而不释乎？”

（卷 182，第 1854 页）<sup>[1]</sup>这与孔颖达《正义》的主旨是一致的，也是他承关氏之学而随时代之发展。

#### 参考文献：

- [1][清]董诰，等. 全唐文[Z].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2]孙猛. 郡斋读书志校正[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3]王冀民，王素. 文中子辨[A]. 文史：第 20 辑[C].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4][唐]赵蕤. 关氏易传序[A]. 关氏易传[M]. 续修四库全书（一）[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5][元]胡一桂. 周易启蒙翼传外编[M]. 四库全书[Z]. 景印文渊阁本.
- [6]洞极真经[M]. 马国翰. 玉函山房辑佚书[Z].
- [7][宋]朱熹. 周易本义[M]. 四库全书[Z]. 景印文渊阁本.
- [8][明]方孔炤. 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一）[Z]. 济南：齐鲁书社，1983.
- [9]关圣帝君迹图志；增集[M]. 陈铁儿. 武圣堂集[Z]. 香港，1961.
- [10]关氏易传[M]. 续修四库全书（一）[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11]孔颖达. 周易正义[M]. 阮元. 十三经注疏[Z].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2]马宗霍. 中国经学史[M]. 上海：上海书店，1984.
- [13]李道平. 周易集解纂疏[M]. 北京：中华书局，1994.
- [14]朱谦之. 老子校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 [15][元]脱脱. 宋史[Z]. 北京：中华书局，1972.
- [16]黎靖德. 朱子语类[Z]. 北京：中华书局，1994.
- [17]胡渭. 易图明辨[M]. 四库全书[Z]. 景印文渊阁本.
- [18]文中子中说[M]. 诸子百家丛书（影印浙江书局本）[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19]蒋清翊. 王子安集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林忠军